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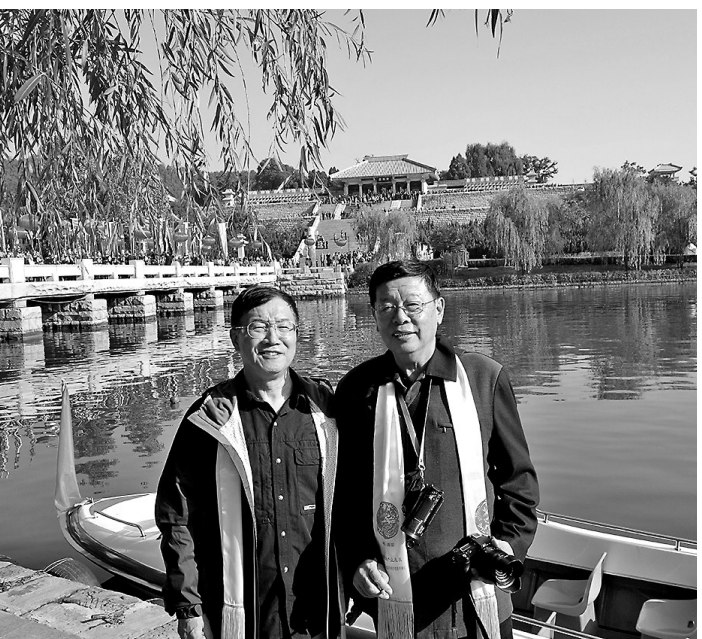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走过青春

### 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



● 2014年10月,北京知青赵新平重回黄陵县隆坊镇强村



● 2014年10月,北京知青吴芝庭(左)与李唯(右)回黄陵祭祖



● 2014年10月,知青丁淑敏(左一)滑玉珍(左二)、郑丽军(右一)回黄陵祭祖



● 2015年3月17日,北京知青贺乃欣在黄龙三岔塬留守知青唐荣琴承租的果园里劳动

# 难忘的岁月

徐永群

1970年的一天,被迫离开工队的我慢慢腾腾沿着延河畔走着。招工无望,我只好再次回到生产队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内心不痛快又无处发泄的我,只好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扔进了延河。

“张大志,大志!”突然,身后传来了呼唤声。

我转身一看,一位瘦瘦的、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的女生跑了过来。我仔细一瞅,原来是小学同班同学关艳。几年未见,她亭亭玉立,长成了一漂亮的大姑娘。

“真没有想到,能见到你。”关艳顾不上擦拭汗珠,双眼紧紧注视着我。

“你也长高了,晒黑了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能在延安城遇到小学同学。

我与关艳从小就是要好的朋友,两家也走动得比较勤,因为我们的父亲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。

“你也来延安插队了?”

“躲不过去,全班端了。”

通过交谈我才知道,关艳在延长县插队,今天刚刚到延安。她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,要她到成都军区报到。我没有想到这小丫头竟然当兵了!

“大志哥,我们一块走吧!”关艳

非常真诚地说着。

我当然也想去,可我家的情况与关艳家的情况不同。就是关艳带我到了成都军区,我的政审也通不过。解放军部队怎么会吸收反动军官的后代呢?

“不管,张伯伯是抗日名将,我去跟司令员说。”关艳不依不饶。

“得了,甭费功夫了!”我心中有数。除非解决父亲的问题,给予父亲公正的评论,我才有入伍的资格。

我们沿着延河畔走着,不知道是她在送我,还是我为她送行。

当走到延河大桥上,发现国营照相馆在这里设了摊位。这里位置很好,远处是宝塔山,脚下是涌动的延河。风景这边独好。

“明天我就走了,我们照张相吧。”关艳不由分说,拉住我摆好了姿势。

随后,我们绕着延安城走了好几圈。不知不觉,太阳快落山了。金色的夕阳铺满了大地,热闹的延安城终于安静下来。我执意把关艳送回延安的招待处。

分别的时刻到了!关艳的眼圈红了,紧紧拉住我的手,久久不放。此时此刻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不知

道该说些什么。

一周后,我收到照相馆寄来的照片。照片上的我们都那么单纯地笑着,关艳紧紧依偎着我。

我不知道笑容是姑娘在大胆表白,还是我故作多情?

关艳走后一直没有音讯,我也不知道照片该寄往何处。

我回到北京,凭着印象,再次找到关艳曾经住过的独立四合院——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捉迷藏、打枣、堆雪人、放爆竹……可现在,四合院早已拆了。经多方打听,得知关艳的父母已经调到南方某军区任职。

数十年了,我随身都揣着这张照片。闲暇时,我掏出这张伴我走南闯北的、已经发黄的的照片沉思着。心想:“关艳呀,难道你真的消失了吗?”

2008年,北京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,我有幸参加了开幕式。我坐的位置是组委会指挥区域。

在现场,我看到陪同外国官员的一位中年妇女很面熟,听到她用熟练的英文与外国官员交流着,并安排其入座。从她含笑的面容中,我认出来了,她就是关艳。

我控制着急速的心跳,压抑着兴

奋的情感,站了起来,迎着她走了过去。

“请您出示贵宾卡。”工作人员有礼貌地拦住了我。

“请看,我是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成员。”我笑着指指胸牌。

工作人员赶紧说:“对不起,首长,您需要找什么人吗?”

“我来找她。”我用手指指前面的关艳。

这时候,正在与老外高谈阔论的关艳听到了我的声音。只见她停止了谈话,望着我发愣。继而她拨开几个人,朝着我喊道:“哎哟,大志哥!”

我握住她的手,只见她眼泪扑簌簌往下掉。我也有些伤感,一时语塞又无法表白。

“对不起!我正在从事重要工作,不能对外联系。”

“我找你找得好苦!”我终于吐出了这句话,当面说出来反而是释放。

“请您回到座位上,开幕式马上开始了。”工作人员指指硕大的钟表示意我。

我从贴身的口袋中掏出那张发黄的照片塞到关艳手中,然后转身向组委会指挥区域走去……

# 记忆里的雨

王春英

1969年1月初,我离开北京,来到延安宜川离黄河最近的一个村子插队。

这个村子不算太大,也就二百来口人。因为是同一个家族,全村都姓周。村里每个人见到我们都很友好客气,这让我们这帮知青很欣慰。

陕北天气太干燥,到处是黄土坡,树干也是七裂八歪的。在我的记忆里,不下雨的时候,村里的老人们就三一群两一伙结伴去村子里的破庙,求佛拜菩萨,以求降雨。

虽然文革“破四旧”,这些泥菩萨

被破坏得四肢不全了。可即使这样,也阻止不了信仰崇拜的老头老太太们。也许真的是老天爷被感动了,这几天还真下了雨。可这一下,就停不住了。那淅淅沥沥的雨声,听得人烦躁。

想起这场雨的同时,我也想起了1977年延安那场莫名的大雨。据说,这场大雨200年来都不曾有。当时,整个延安城下的是暴雨,小沟小溪早已溢满雨水。延河都一改往日的温柔,就像脱缰的野马般奔向黄河。暴雨使延河干流出现一个洪峰后,紧接

着又是一个更大的洪峰。当时,延安市洪峰流量达到8960立方米秒,淹没冲毁耕地18万亩,冲倒房屋5000多间,死亡134人,冲毁小水库200多座,洪水把延安城先劫了一遍。

这场雨给多少家庭、商场、农村、田园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当时,我正回到村里和老乡们站在村口看黄河发大水。水流很大,一涌而下,河面上到处翻滚着东西。

眼看着这些东西一晃而过,可是却不能打捞,因为水势太急。在这场灾难中,除了损失了东西,还有多少不

幸的家庭失去了亲人。后来听我村的老人说,当时,上游冲下几个女子,正好搁浅在我村黄河滩附近,看样子是一个宿舍的学生。被我村几个好心人打捞起来,放到河滩边高处。这样,寻找她们的家人就容易看见了。最后结局如何,我就不不得而知了。

岁月蹉跎,带走了多少往事;人生无常,锁住了多少牵挂。只有回忆才能留下心里的过往。有些事可以忘记,有些人可以忘记,可我就是忘不了我的第二故乡延安,忘不了曾在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。

# 情债

曹惠明

上学了,进了学校,老师教育我们时说得最多的话,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,听党的话,听毛主席的话。尊老爱幼,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毛主席发出号召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出于好奇心的驱使,我们按毛主席的指示,准备到陕西插队。

到陕西去,行李箱、衣物、盆、碗及个人洗漱用品都要准备。家中姐弟五人要吃要喝,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支撑,生活是有些紧张的。为了我,妈妈把自己的红旗牌自行车卖了,买了下乡要带的新衣服和生活用品。

我牢牢将这笔情债记在了心里。当时我想:“等我有能力了,一定要给爸妈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”

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。”来到农村插队,我努力去适应这里的一切。春播时,往地里挑粪、撒粪、种玉米、投籽,从来没有落后过。夏天收麦是个巧用劲的活,我们根本不是农民的对手。队长让我们往麦场背麦子,这可是要拼毅力的。锄地还是比较老练,秋天收玉米,也是砍倒玉米秆堆起来,然后再两人面对面坐着掰玉米。熬了一年,要回北京过年时,我兴奋地收拾着东西——20斤黄豆、20斤青豆、20斤核桃准备好,装手提包里。还要提一个口袋,外加点零东西。肩上

背的手里提的,整个一个逃荒者。

回到北京后,我对爸爸说:“您不是有支气管炎吗?20斤核桃是买给您的,我还买了5斤蜂蜜。四五个核桃、两勺蜂蜜再配一个鸡蛋蒸在一起,有止咳补气的作用。”天遂人愿,爸爸的病真的有所好转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又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有一天晾晒被子,发现被子已经有了破洞。我当教师每月有10元补助,当时我看到自己的被子应该换新被子了,也想到远在北京的爸爸妈妈,弟弟妹妹们的被里也该换了吧。我来到供销社,问了一下棉布的价格。有俩毛八,一尺的,还有三毛四分五尺的。那就买三毛四分五尺的吧!我给自己买了被里后,

又给家人买了七床被里。回北京时带给家人,略表一点心意。

结婚后,一直记得曾经在心里许下的给父母买一辆自行车的诺言。可先生家是农村的,他的父母有病,需要钱。我们省吃俭用一个字——寄!好歹熬到夫家父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,欠爸爸妈妈的自行车该还了。可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事情。我们首先要开始存钱,还要有自行车票。最后,我终于为父母买回了一辆自行车,了却了自己永久的心愿。

我们都是父母的儿女,我们的一生不管给父母做过什么,比起父母为我们做的,都是毛毛雨,因为情债是永远还不清的。

# 教书南河寨

刘雅琴

1969年初,我和十八名同学来到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插队。作为一名从北京来到这里的知青,初到农村,看什么都觉得新鲜。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,我们学会了一些农活。

第二年的春天,生产队长突然来找我,他对我说:“大队里的七年制学校缺少一名教师,你在村里当出纳,又有文化,普通话说得好,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经过慎重考虑,我答应了队长的安排。

学校是租用的一所民房,条件简陋,摆了一些桌椅,有二、三十个学生。我负责教一、二、三年级。我拿到课本,备了几天课,就硬着头皮走上了讲台。由于各年级学生的人数不等,又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,我将他们分成三组。从左边数第一列和第二列是一年级,有十个学生;第三列和第四列是二年级的十二个学生;第五列和第六列是三年级的十个学生。第一节先给一年级学生讲语文,二、三年级学生预习新课;

一年级的课讲完后,学生们开始写作业,我再开始给二年级学生讲语文;二年级的课讲完后,学生开始写作业,我再给三年级的学生讲语文、布置作业。

时光飞逝,转眼间到了夏收时节,农村学校要放农忙假。我带领着我的学生们到麦田去验收时掉下的麦穗,然后交给队里,得到队里的一致好评。看着同学们戴着小草帽,唱着歌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在麦田里一晃一晃的,像田野上盛开的一朵朵小花。金色的太阳,金色的麦田,金色的小草帽,仿佛是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图。麦田附近的山坡上长着许多山桃树和山杏树,春天里,漫山遍野盛开着桃花和杏花。麦收时节,桃、杏成熟了,熟透的杏落了一地,我和学生们跑去连摘带吃。杏儿酸甜,很爽口,学生们摘了杏带回家去,我也摘了不少。吃不完就晾成杏干,冬天可以当零食吃。

放了寒假,老师也不闲着,还有任务。那就是要对学生进行家访。

有的学生上学早,有的上学晚。每个年级中,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。很多家庭不让女孩上学,还有中途辍学的。学校的要求是让学龄儿童都上学,要老师去辍学学生家里了解情况,让他们能继续上学。南河寨是个大村,周边村子的孩子也来上学。家访第一站,我选了一个邻村的学生,这个学生的住所距离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。由于不认识路,待我一个人七拐八拐地找到他家,已经是中午时分。他家一看就很贫困,土窑洞已经出现裂口。进了门一看,院里都长了草。见到孩子的父亲后,我说明来意,并向他讲清楚学文化的好处,动员他让孩子继续上学。

“刘老师,帮我说说,我要上学。”见到了我,孩子像见到救星一样,企求着我。这时候,学生家长面露难色,说:“家里缺劳力。”我接着说:“你不要让孩子走你家的老路,当个睁眼瞎,别耽误了孩子的一生。”家长终于同意孩子继续上学。我带

着胜利的微笑,起身告辞。他们要留我吃饭,我婉言谢绝。在往回赶的路上,我啃着自己带的干粮。

冬天山里天黑得早,南河寨和邻村之间隔着一条山沟。到了沟沿上,天就快黑了。看着黑乎乎的沟底,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这时,沟底传来凄厉的狼嚎,真瘆人。听到这声音,我扭头就往回跑。跑到一个村子里,天全黑了。我向村里人打听,问他们村有没有知青点,他们说有一个。顺着老乡的指引,我找到知青们居住的窑洞,说明情况,希望留宿一夜。那个女知青很痛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一早,我就回到了队里。直到现在,我连那个女知青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但是我感谢她,我会一辈子记着她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,自己在南河寨学校教书的情形还历历在目,我教过的那些孩子现在也步入老年。我真想听他们再喊一声“刘老师”,真想再和他们一起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!